

反读书记(九十三)

□胡文辉

濠上漫与陈尚君

□雷雨

几乎每天都要给父母通个电话,互道平安、说些琐事。有次父亲提到,复旦的朱东润先生写过《元好问传》。就去找朱东润先生的《元好问传》,发现整理书稿的是朱东润先生的学生陈尚君教授,而陈尚君教授的一册随笔《濠上漫与》,恰好就在书桌上,随意一翻,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濠上漫与》总计汇集陈尚君教授读书随笔五十六篇,大致为三类文字,或为读书而生发之感想,考订、议论,都多有新见,不是人云亦云之语;或为学界掌故,涉及诸如章太炎、唐文治、朱东润、傅璇琮、冯振、程千帆等,或披露他人所未见,或述说自己的请益问学,娓娓道来,颇可一读;或为自己读书心得,月旦人物,很是老辣,如评说张荫桓、熊希龄、张元济、张钫等,生动传神,引人入胜。《独孤三姐妹》《扬州几曾有迷楼》《唐太宗的另一面》《殷颜世婚与文化传承》《重读李林甫》《讲故事的高力士》《郭子仪的生存智慧》《元载的平反》《上海的唐诗僧》《高贵的灵魂》《改一个字好难》《存世唐诗知多少》《跋上海图书馆藏汲古阁影宋写本〈极玄集〉》《吕洞宾的最早记录》《〈唐诗鉴赏辞典〉文献审读》《唐时明月照人来》《两种唐诗选》《述〈唐人选唐诗新编〉》《讲清杜甫离开草堂的缘故》,这些文章都与唐代有关,属于陈尚君教授着力耕耘的疆域范围之内,在陈尚君教授看来,《全唐诗》谬种流传,以讹传讹,张冠李戴,错误甚多,唐诗数量,大致在五万四千首,而往往流传甚广的名句,也为后人篡改,甚是可恶,如“昔人已乘黄鹤去”,实际上是“昔人已乘白云去”。陈尚君教授的这些考辨文字,生动摇曳、精心雕琢、耐读好读。

走出大唐,陈尚君教授依旧议论风生、快言快语,以宋为例,《尴尬的〈春秋〉笔法》,讲述欧阳修的治史原则,提到了“狼虎丛中亦立身”的冯道,比较了欧阳修与司马光的不同,这样的议论,较之当年黄裳与张中行关于冯道的纷争,似乎聪明机智多了。《司马光的团队》《读书种子刘恕》,特别提到了司马光的三个重要助手刘敞、范祖禹、刘恕,这也让人想起郭沫若、范文澜等人领衔著书立说的事情来。今年是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捧读《资治通鉴》这部据说被毛泽东读过十七遍的史学名著,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宋代好记者》是关于《夷坚志》《容斋笔记》的作者洪迈,洪家一门,文风昭著,令人羡慕。《夷坚志》上承《世说新语》,下启明清笔记,《子不语》《聊斋志异》,不都受其影响?《贾似道的困局》《宋本之可重》《元好问的大节》,论及宋元,贾似道被认为是南宋继秦桧之后的又一权奸,但这样的灰色人物,陈尚君教授指导自己的博士生张春晓独辟蹊径,精心研究,结果醒人耳目。贾似道的人生轨迹原来是如此跌宕起伏斑斓多彩,怎能用大坏蛋一语一言以蔽之呢?张春晓是程千帆先生的外孙女,沈祖棻先生是她外婆。

如果以为陈尚君教授的目光仅仅停留在唐宋,不越雷池半步,那就大错特错了。《郭嵩焘与严复的忘年交》《偶读张荫桓》《狄史唐短》《唐文治谈古文作法》《张元济先生的朋友圈和人生志业》《章太炎先生的最后五年》《斯世再无熊希龄》,纵横交错,杂花生树。郭嵩焘是晚清名臣,严复是大翻译家,两人竟然有如此交往,令人大开眼界。张荫桓一直是有争议人物,但一定是能员干吏,陈尚君教授提到翁同龢说自己有三位广东人朋友,除了张荫桓,另外两人是谁呢?张荫桓死在天山脚下,他作为所谓翁门六子之一,与翁同龢彻底决裂分道扬镳,其间恩怨,很难理清了。章太炎先生在晚年如此关心时局,对冯玉祥如此寄予厚望,如今的人断难想象。

陈尚君教授还提到了程千帆先生、李庆甲先生、陈允吉先生、陶敏教授、李时人教授、张祝平教授,都是非常让人感怀的好文字。吴中杰教授有《海上学人》《复旦往事》,陈尚君教授的复旦“往事”,如果形诸笔墨,也一定是气象万千云蒸霞蔚的啊。《美国的补丁》《美国总统的病历》也是好文章,但建议陈尚君教授若再修订此“濠上漫与”,可否把这两篇文章忍痛割爱,放到其他文集里,这样似乎无违和之感。嘿嘿。

257

过去,世界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之外;现在,关于世界的知识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之外。

258

明星可以覆盖极大的范围,但只能属于一个时代;经典可以属于所有时代,但只能覆盖极小的范围。

259

表面上看,考据学不离故纸堆,无非是在史料和史实层面打转转而已。可是,考据学也有高明与平庸之分。要达至考据的大气象,也需要有思想学术的综合素养作为支撑。考据功夫本身,决定了考据的根基;但考

据功夫之外的知识背景,才最终决定考据的高度。

试看近代以来以考据名家的学人,王国维、胡适、傅斯年、顾颉刚……大多涉猎广博,有西学新学的背景。即如孟森、陈垣之类,其成就似仅限于史实考辨方面,但实则陈早年信仰基督教(间接触悉西学),且写过时评,孟曾从事法政领域,更主编过《东方杂志》,皆非只懂钻故纸堆的专家。

只有考据功夫的考据当然是考据,但只是学匠式的考据。

260

在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中,都存在好的伦理,也都存在坏的人性,区别只在于,如何通过制度和法律的作用,使伦理之善最大化、使人性之恶最小化。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二一



新书快递

爱书来:扬之水存谷林信札

谷林著 樱宁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本书是谷林、扬之水两位在传统文化上卓有贡献的当代文化人的书信集。谷林的书信,文化界素有“这是中国最后的信”,全书共收二人往来书信近200封,近半数未经刊布,展示了1990年代至2008年二十余年间,两位文化人的忘年交,一部分内容堪称“《读书》外史”,另一部分内容足见两位作者的工作、贡献及所思所见,书信风格雅正,温柔敦厚,特别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灵性和优雅风格。书名取自吴梅村诗句“惯迟作答爱书来”,并精选数封手书影印作插图,文质彬彬,宜读宜藏。

古籍之为文物

李开升著
中华书局

本书探讨的主要是明代形成以古籍为文物的观念以后的藏书史和版本学问题。版本学正是起源于对书籍的文物性收藏。其中第一篇《古籍之为文物——明代出现的新型藏书家》讨论将书籍作为文物收藏源于明代藏书家对宋本的赏鉴和收藏,这也是版本学的起源。因全书内容主要集中于藏书史和版本学,故以此篇标题为书名。

托尔斯泰一样写故事

[英]理查德·科恩著 徐阳译
大象出版社

每一部备受赞誉的文学作品背后,都有一个巨大的仓库,装满了素材、选择与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奇怪装置。从情节、人物发展,到对话和视角,每一个小说家都为故事的每一个元素投入过极大的、甚至强迫症式的努力。从托尔斯泰到斯蒂芬·金——本书将带你潜入世界一流作家的脑海,看最富创意的头脑如何将具体的、棘手、写作技巧方面的问题。

装帧指南

[英]托马斯·W.霍奇金森、休伯特·范登伯格著 陈以侃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本书向读者介绍了海德格尔、蒙田、卡尔·波普尔、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安迪·沃霍尔等200多位知识分子聊天时最爱提到的文化人物,还提供了充满创意的“使用方法”。读罢这本书,你再也不愁会将黑格尔与恩格斯混淆起来,也能完全掌握如何在一场对话中适时地插入福柯这个名字,以及诺奖作家库切的名字如何发音才地道。除此以外,在介绍每一位文化名人时作者都不忘佐以趣味八卦,机智风趣、令人莞尔、过目不忘。

261

自然(本能)造成的愉悦,谓之快感;人工(艺术)造成的愉悦,谓之美感。

快感比美感来得强烈,但转瞬即逝,以至于我们总是来不及感受明白;而美感是温和而舒缓的,我们可以细细品味。

262

音乐是“与时俱进”的——它永远处于动态,在时间之河中涌动,随着时间的流动而流动。它不能停顿下来。(音符的停顿并不是停顿,而是整个旋律的一部分,就像笔触的空白并不是空白,而是整个画面的一部分。)我们无法在听觉上将音乐带来的愉悦留住,正如我们也不能在味觉上将食物带来的愉悦留住。我们所能留住的,只是对愉悦的印象而已。

巫宁坤:
“钱先生当然
看得起的人很少”

——旅美学人谈钱锺书(二)

□钱之俊

巫宁坤2019年去世,一段时间内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但平时是很少有人关注他的。巫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专门回忆他和钱锺书的交往过程。李怀宇这次采访中的只言片语,或许可以再丰富巫先生文章的遗漏,增加我们对他们之间情谊的了解。

巫宁坤1939年到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时,钱锺书刚好是年暑期离开。他遗憾地说:“我不但无缘受教,对他的才华风采一无所知,甚至连他的鼎鼎大名也毫无印象。”(《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钱锺书的老师吴宓成了巫宁坤的老师,教他们《欧洲文学史》。巫宁坤认为吴宓“当然有大学问,我当时一无所知”。关于钱锺书是否说过“吴宓太笨”的话,他说:“杨绛不是否认吗?话很像他讲的。我中间当了几十年右派,到1980年代回到北京,常去看钱锺书,他从来都是欢迎的。我跟他没有学术上的关系,我也没有崇拜过他。我跟他一起当过翻译,他是前辈,我是小翻译。”(《家国万里:访问旅美十二学人》,下同)“钱先生当然看得起的人很少。”

1951年夏,他自美回国在燕京大学任教。回国前,他在美国本可以拿博士学位了,可他并没有坚持读下去就回国了。他说:“我们那一辈人当博士导师的,很多没有博士学位,像李赋宁就没有博士学位。钱锺书也没有,他是文学学士,毕业以后一年,交一笔钱,就可以封一个硕士。”

到燕京不到一年,巫宁坤就被调去当亚太会议翻译。这时他认识了钱锺书,“我那时候有情绪,觉得让我翻译这东西不是浪费我的生命吗?他们讲的都是套话、空话,而且文字实在是狗屁不通。钱锺书先生就提醒我不要出声,他当时就是老一点的教授,并不是后来这样了不起的泰斗级人物。他跟我一样要搭交通车去上班。”巫宁坤当时年纪轻,又刚从国外回来,对新形势不了解,心里翻来覆去,这为他以后“受难”埋下祸根。

翻译工作结束,巫宁坤被调到南开大学任教。1956年6月,他又被调回北京。两个月后,他又奉命到中共八大翻译处任翻译,再次和钱锺书共事。他的性子变化不大,说话仍无顾忌。没想到,一年后,因言获罪,被划为“极右分子”。在此后近20年中,他历经磨难。好在他心态好,能坦然处之,反而为其他人感到惋惜。他认为吴兴华死得可惜,太早了,“他那么聪明的人,恐怕超过钱锺书啊!说老实话,他的英文可能比钱锺书好。”

1979年,他“错划右派”得到改正,返回国际关系学院。“我一回去,钱锺书就跟我很多来往,他很好,从来不谈过去的事,也不问我。我们东拉西扯的,不用提话题,他可以从这个题目跳到第二个题目。”从他们初次见面,到此时,一晃近30年,各自“身经百战”,恐怕都再也无心谈政治了吧。第一次拜访钱府后,他就收到他们赠书数种,“二老从来没有就我们20多年来的坎坷经历问长问短,并不是他们冷淡无情,而是心照不宣吧,这些珍贵的馈赠,即时传达了无言的慰藉的深情。”(《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